

象,这是史学发展的一个进步。另外,专题研究的进步带动了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交流。在本次会议中,各个断代史、专门史领域的学者,为推进本领域的研究,往往自觉地借鉴、利用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为彼此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创造了条件。随着这种对话和交流发展,学界必定会形成一些为多个领域的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具有牵动力的话题,从而推进学术的进一步发展。最后,学术的传承,体现为一种自觉的学术史意识,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整理和反思,找寻该领域的学术前沿和个人研究的学术起点。这既是对前人研究的继承,更是对前人研究的超越。本次会议成果斐然,其所反映的作者学术能力之不俗以及对新学术思路的掌握,相信将带来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陈扬)

“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6月24—28日在厦门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学术月刊》编辑部、天津古籍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台湾以及日本、韩国的海内外50余名学者共同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以“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明代历史对世界文明进展的影响”作为主要议题,收到与会学者提交的30多篇论文,涉及明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族群关系、中外交流等诸多领域,并从基本预设、思考向度、问题设计、理论性话语等角度,探讨了将明史研究向纵深推进的可能。

本次会议以“明史在中国史上的地位”作为主要议题之一。台湾东吴大学徐泓做题为《明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主题发言,对清代以来对明代的评价作了全面的检视与回顾,着重探讨了针对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停滞论和明代后期是否是中国近代文明的曙光这两种明史评价中的歧见。徐泓认为,应当本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职业伦理,减少时空氛围的影响,以期对明代这个“多重性格”的时代和“多元结构”的社会得出和而不同的共识性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商传对明代的文化特质进行定位,认为明中叶以前的文化是官文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明中叶以后,民间文化取官文化而代之,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万明则从法制史的角度,通过对明朝诏令的考察,指出明朝新的法律体系开启了后来清朝的法律体系,在中国法制史乃至中国古代史上有重要地位。

如何看待代际更替和社会变迁,常常是对明代进行历史定位的重要切入点。北京大学赵世瑜着重从区域社会史的路径来考察易代之际“不清不明”与“无明不清”的复杂历史现象,认为在对明、清的评价中扬抑任一方都有失之偏颇之嫌。北京大学李新峰提出元明之间发生了比两宋、宋元、明清之间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可丰富对宋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同样关注社会变迁的,还有厦门大学刘婷玉对成化、弘治时期作为明代重要转型时期的研究。

针对会议另一主题“明代历史对世界文明进展的影响”,与会学者同样进行了诸多有深度的探讨。厦门大学陈支平提出,如果把明代的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考察,明代历史是中国历史从“区域史”迈进“世界史”的关键时期。对于早期的西方殖民者,此时的中国从思想文化到社会经济与国际贸易,乃至军事对抗,均能采取比较积极的应对姿态。这种趋势应当成为我们认识明代历史地位的最主要标志。复旦大学张海英也认为,同鸦片战争以后相比,晚明中国经济与世界市场的交流,是一种无可争议的辉煌,研究晚明的社会变迁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如何在将明史与世界史联系起来的过程中保持客观的研究态度也为学者们所关注,南京大学范金民在对郑和下西洋史实进行详细的考证论析后,回应了当前郑和研究中的某些不实夸大之处,但仍然认为其不失为明朝在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地位和影响的重要标志。明史与世界史相联系思考的进路,是引起与会学者最热烈讨论的问题,陈支平指出,由明至清与世界交流的渐趋沉寂,不仅是明代自身发展趋势所全然决定,也与其时欧洲本身历史的发展无关系。会议还就此特别邀请台湾辅仁大学的世界史专家王芝芝进行发言并展开讨论。

无论是重新定位,还是放在世界史的框架中考察,都体现着学者们对明史研究范式的再思考。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在对明史研究的断代为史的“国家史”取向、“西方中心主义”、“地方知识”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联、“支那学”与“满蒙学”阴影等问题进行回顾后,指出在当前新的学术生态中,仅从明史内部来看是不够的,还需要从明史之外来作出审视。

除了从宏观层面对明史研究进行重新定位,本次会议中亦有为数不少进行个案研究的论文。这里大致分为政治、经济、军事、环境、族群关系与对外交流、宗教几方面进行介绍。

政治制度和政治精英。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山本英史通过对地方官们到任、离任的时候时常采取的特异行动,来考察明清时代地方官员如何平衡理念与实态以实现有效治理的。阿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以徽州诉讼文书为中心,对明代民事诉讼程序的若干问题进行分析。张兆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探讨了明代对传统荒政的继承与完善,就明代预备仓的创设、监察官员的地方化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故宫博物院赵中男指出了明代宫廷典制具有全面性、繁杂性、综合性、法规性等特点,以及从宫廷礼仪的角度重新认识明代政治发展的意义。有关政治精英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解扬对万历年间大臣冯琦的研究,指出冯琦的举措,实为展现于晚明政坛上的一种务实处理朝廷政务的政治手法。厦门大学江柳青对同为万历年间大臣劳堪的研究,是将其作为清算张居正政治运动的典型并看作万历朝政转向混乱无序的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宪博通过对东林党人讲学事迹作详尽的个案考证,指出清高宗对于东林讲学的指摘别有目的,其实“讲学非亡明,攻讲学者亡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时龙则更多的将明代的学人讲会作为社会现象来考察,廓清了明代讲会的规模、会址、会期及频率、主讲与成员、内容、气氛、会约与会簿、会语、经费和教化功能。

经济依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韩国江原大学元廷植对明清福建地区烟草产业的形成及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厦门大学王日根揭示了明清时期福建地区海洋经济与山区经济联动的形成、影响与政府治闽政策的变化。厦门大学林枫则通过回溯明代商业经济史的既有研究,关注到商业史研究新的研究动向和若干不足。

军事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金奎从族谱资料出发,考察比较了明代三个

卫所军户家庭的演变实态,揭示了明帝国广大疆域中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厦门大学王尊旺对关系边镇军饷供给的明代遮洋总的设立时间、运输路线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同样关系到明代边镇防御的,还有明代长城图籍的绘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赵现海对明代的四部长城图籍《九边图志》、《九边图论》、《皇明九边考》、《九边图说》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在明代边防图籍编撰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对后世认知九边的影响。

环境史研究是近年热点,本次会议亦有两篇文章涉及。厦门大学钞晓鸿围绕项忠与明代关中水利修筑的关系,考察了不同文献对作通济渠、广惠渠的分歧之处,指出人物传记中史料、史实选取具有主观倾向性,在水利史的研究中应加以特别注意。厦门大学佳宏伟对明清之际的江南姚廷遴家族作了医疗史、环境史的考察,探讨了明清交替之际的“天灾人祸”对于一个家族社会的影响实态。

本次会议有几篇文章关注到明代内迁民族的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奇文瑛就明朝接受的几近百万的内迁归附人进行考察,揭示了明朝政府的民族政策及明代北方民族杂居中原的状况和不断交融的历史趋势。中央民族大学彭勇考察了明中后期以降京畿地区的一支全部由北方少数民族组成的武装力量由“达官军”到“忠顺营”的演变与民族融合。厦门大学周雪香从明中叶的流民对南方山区的开发入手进行研究,梳理论证了“客家”最初应是明隆庆三年长宁、永安建县后,当地土著对来自闽西及粤东北潮惠地区的“异邑民”的称呼。

涉及明代宗教的论文有两篇。南开大学何孝荣结合汉、藏文献史料,对明宣宗崇奉密教的表现、原因及影响加以论述,认为其一方面导致了明代朝政的腐败黑暗,一方面对汉藏文化交流多有促进。厦门大学高致华论述了台湾“开台圣王”与“开漳圣王”信仰文化的流布与传承,凸显了明以来宗教信仰对台湾移民社会形成的重要意义。

(厦门大学历史系 刘婷玉)

“明代蓟镇文化学术研讨会暨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会 戚继光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迁西召开

迁西位于燕山南麓,长城脚下,滦河之滨。这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关于明代的历史资源也极为丰富:有蜿蜒 87 公里的明长城,有潘家口、喜峰口、董家口、青山关等古塞雄关,有明代“九边重镇”之一——蓟镇,有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总兵府,以及戚继光的传说和事迹等。这里美丽的自然风光与深厚的历史文化混然天成。2010 年 10 月 21—22 日,在这座美丽的山城,举行了明代蓟镇文化学术研讨会暨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会戚继光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这次会议由中国明史学会、河北省燕赵文化研究会、中共迁西县委、迁西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明史学者、长城文物学者、地方志学者及新闻出版界人士共 100 余名代表参加了这次次会议。中共迁西县委书记王东印致欢迎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